

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记

——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研究

主编：孙建科 宋玮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孙建科 宋玮明 主编

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记

孙建科 宋玮明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论/孙建科、宋玮明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2

ISBN7-207-06514-0

I.湖… II.孙、宋… III.教育实践—研究—文集. IV.G35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045

责任编辑:安晓峰

封面设计:黄海棠

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论

孙建科 宋玮明 主编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 150008)

南京文博印刷厂印刷

200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印张

字数 296千字

印数 1-1000册

ISBN7-207-06514-0

G·1528 定价:28.00元

序 言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株灿烂的奇葩,它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从屈原、贾谊到王夫之、毛泽东,几千年来,它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儿女,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与富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深入开展对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研究,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每个湖湘学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论》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驱动下的湖湘学子们奉献给我们的又一新的学术成果。他们对湖湘传统的不懈追求和艰难发掘,形成了本书的如下特色:

一是脉络清晰。本书将湖湘文化的萌生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区分为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以简明清晰的历史脉络展现给读者。其主要思路是:即从先秦至隋唐为湖湘文化的孕育时期,两宋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时期,元明清三代为湖湘文化从低迷到复兴时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湖湘文化大发展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为湖湘文化的新飞跃时期。这种分期方法不仅脉络清晰,阶段分明,而且揭示了湖湘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特点,富有科学性。应当说此书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分期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

二是主线突出。全书始终贯穿了爱国主义这根主线,中心突出。书中按照将湖湘文化划分的五个时期所写的5篇概论,是研究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传统的专题论文,它对湖湘文化中最突出的爱国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形成标志,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中心内容、主要表现及基本特点等等都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同时对湖湘爱国主义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作了充分肯定。书中所撰写的 51 个(其中有 8 个是在合传之中)湖湘爱国精英代表人物传,每个人物都是突出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行动、主要事迹、对祖国的贡献与深远影响,其它方面则只作简略交代,因此可说本书是研究湖湘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一部力作。

三是资料新异。书中撰写的湖湘爱国精英人物传记,不仅大量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而且挖掘了一些新资料。尤其是湖湘历史上有些人物,如蔡伦、杨再兴、张虎、彭翼南、彭荃臣、郑国鸿等人,过去历史上记载他们的史实不多,材料较少,而这次本书在进行较为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挖掘了不少新资料,写出了较以往更为全面、详尽的人物传记,并以最新的观点,做出了较为中肯的历史评价。在湖湘爱国精英人物研究史上也起了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

四是传论结合。本书采用传论结合的体裁,具有开开创性。书中共有 5 篇研究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学术论文和 51 个爱国精英人物传记。传以论作指导,论以传为依据,互相配合,互相印证,相得益彰。书中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能提高人们对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传记的写作具体生动,能避免空洞的说教,读来颇能引人入胜。可见本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确是一本可雅俗共尝的好书,而这种传论结合的体裁也是当前学术著作值得提倡的一个新方向。

现在,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为民族新崛起、中华再腾飞而献身的爱国主义热潮,正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蓬勃兴起。《湖湘历代爱国精英传论》的出版,为我们结合湖南的乡土实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本好教材。在当前改革开放,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以传统教育为契机,引导人们继承三湘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无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领略博大精深的湖湘传统，传承忧乐天下敢为先的湖湘精神，对于深受几千年湖湘文化浸润的湖湘学子来说，是历代英烈嘱咐的历史重托，任重而道远！然而，无论学途多艰辛，我们将永远谨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朱有志

2004年12月3日于道州

（序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目 录

序言	朱有志(1)
一、湖湘文化孕育时期的爱国主义	(1)
(一)概论	(1)
(二)湖湘爱国鼻祖屈原.....	(10)
(三)忧国忧民的太傅贾谊.....	(16)
(四)造纸术的发明家蔡伦.....	(21)
(五)锐意改革的两司马刘禹锡、柳宗元	(27)
二、湖湘文化形成时期的爱国主义	(35)
(一)概论.....	(35)
(二)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	(43)
(三)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父子.....	(49)
(四)抗金爱国的张栻师生.....	(58)
(五)抗金反宋的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么	(66)
(六)血战沙场的抗金名将杨再兴.....	(71)
三、湖湘文化从低迷到复兴时期的爱国主义	(76)
(一)概论.....	(76)
(二)与孤城共存亡的抗元安抚使李芾.....	(85)
(三)抗元到底的义军将领张虎.....	(89)
(四)平倭勇将湘西土司彭翼南、彭荃臣	(93)
(五)南明抗清名将何腾蛟.....	(99)
(六)坚持抗清复国的大思想家王夫之	(103)
四、湖湘文化大发展时期的爱国主义	(110)
(一)概论	(110)
(二)定海三总兵之一的郑国鸿	(123)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	(129)
(四)致力改革弊政的陶澍、贺长龄.....	(135)

(五)“求强求富”的洋务新政代表曾国藩	(143)
(六)收复新疆的湘军老将左宗棠	(150)
(七)不辱使命的驻英公使郭嵩焘	(158)
(八)“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维新志士谭嗣同	(166)
(九)“一腔热血溅荒丘”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	(174)
(十)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	(181)
(十一)民国元戎黄兴	(189)
(十二)为共和国宪政流血的宋教仁	(196)
(十三)护国运动主将蔡锷	(203)
(十四)首倡“打倒孔家店”的民主斗士易白沙	(209)
五、湖湘文化新飞跃时期的爱国主义	(216)
(一)概论	(216)
(二)立志探索救国道路的青年毛泽东	(227)
(三)“乾坤一少年”蔡和森	(235)
(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向警予	(241)
(五)“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	(247)
(六)拼死疆场的北伐先锋蒋先云	(253)
(七)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	(260)
(八)血洒太行的抗日名将左权	(269)
(九)共和国元帅贺龙、罗荣桓	(275)
(十)抗美援朝司令员彭德怀	(284)
(十一)爱民如子的总书记胡耀邦	(290)
(十二)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298)
(十三)爱国教育家徐特立	(306)
(十四)坚持民族气节的画家齐白石	(313)
(十五)现代戏剧的开拓者田汉	(321)
(十六)工业先导范旭东	(328)
(十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334)
后记	(343)

一 湖湘文化孕育时期的爱国主义

(一) 概 论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许多不同的民族聚居在同一地域,也有许多相同的民族散居在不同的地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一方面互相交流,不断融合,从而逐步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和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这种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同时,却仍然保持和发扬着自身固有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传统,湖湘文化便是统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富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

“湖湘”二字指代湖南省现今地域。“湖”指洞庭湖,湖南省位于洞庭湖之南;“湘”指湘江,它纵贯湖南全境,是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从它产生的渊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成这样几个时期和阶段:(一)从先秦到汉唐,是湖湘文化的孕育时期。这个时期的湖南,地广人稀,生产力不十分发达,少数民族较多,被中原人视为“蛮荒”之地。所以这个时期,湖南出现的名人不多,但其它地方的名人因政治原因而被放逐湖南的则不少。由于湖南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加之外地先进文化的传入,湖南这个时期的文化仍是颇具特色的。如剽悍的民风,比较发达的科学技术,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等,为后来湖湘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二)宋代是湖湘文化的形

成时期。北宋初年,湖南道州出生了一位引道学思想入经学,以太极阴阳解释宇宙发生与起源的思想家周敦颐,被后人推尊为理学的开山祖。到了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胡宏与张栻先后在南岳和长沙创建书院,以周敦颐及其弟子二程为学术正宗,授徒讲学,在湖南培养了一大批卓有学识的人才,形成了宋代理学中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称为“湖湘学派”。由于“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①,且对后代湖南许多重要思想家影响深远,所以后人便把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现象称为“湖湘文化”。(三)元、明、清三朝是湖湘文化发展从低迷到复兴的时期。南宋末年,岳麓师生参加抗元斗争,死者什九,致使湖湘学派不再称闻于世;加上元朝初期对汉族采取高压政策,特别是对南人防范与压制尤为厉害,致使湖湘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低迷时期。然而它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即衍化成湖湘文化的基因,并随着元后期教育制度的恢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如元代后期湖南重建、增修的州县学宫达21所,包括长沙的岳麓书院与衡阳的石鼓书院。元、明时期,通过湖南书院的延续办学,突出推崇以朱熹、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形成了朱、张并重的湖湘理学传统,“以继岳麓之盛,而称湖南道学之宗”。^②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深受岳麓书院学术传统的影响,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并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使湖湘文化的发展走向了复兴,而且把整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四)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夕,是湖湘文化大发展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了80年的近代历史。在这个阶段中,面对西学东渐的浪潮,湖湘文化既保持自己固有的特色,更不断吸收西方近代新学。从邵阳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湖南人由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处处走在时代的前列,涌现出以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易白沙等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的新学人才,把古老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大发展阶段。尤其是甲午战后,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湖湘文化发展的浪潮汹涌澎

湃,蔚为壮观,影响遍于全国。(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湖湘文化进入了新飞跃时期。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现代。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使学西方的中国人从梦中惊醒,转而向东方的俄国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湖湘文化的发展开始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古老的湖湘文化加以改造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包含在一种更高的文化形态即无产阶级的文化形态中,继续存在并得到更新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质的飞跃。

湖湘文化具有许多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的优良学风和学术传统,爱国主义就是湖湘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古老的传统之一,从古代到现代,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就象一条红线贯彻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具有不同的内容、性质、表现形式或特点。

在湖湘文化的孕育期,即从先秦到汉唐时期,湖湘爱国主义内容就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一是如何维护、巩固统一,使国家走向富强。在先秦,尤其是在战国时期,中国分裂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十多个居于附庸地位的小国,各国间互相攻伐,战争连年不断,兼并激烈频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民要求安居乐业,要求统一,各国统治者也希望统一,并力求由他来实现统一,可见,由诸侯分裂走向全国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七国之中,谁能创造条件,即具备足够的实力来完成这个全国统一的任务,则成为当时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从爱国主义的性质来看,由于当时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还没有形成,所以爱国主义是爱诸侯邦国。从秦汉到隋唐时期,历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汉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基础。当时全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君主专

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但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汉代同姓诸侯王势力的扩张,唐代节度使藩镇割据称雄,加上异族入侵,均对统一的中央政府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维护、巩固国家统一,并使之走向繁荣富强,这既是当时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所有爱国主义的全部内容。由于这个时期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形成,所以爱国主义的性质主要是指爱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而不是地区性的诸侯邦国。

在湖湘文化孕育时期,爱国主义围绕着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和如何维护、巩固祖国统一这个中心内容而全方位、多角度展开,凡是符合这个中心的言行都是爱国主义,凡是违背这个中心的就不是爱国主义。概括起来,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古代,湖南属楚国,境内民族成分复杂,许多少数民族居住条件比较艰苦,常受到异族的欺压或外国的侵扰,其土著居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因而养成了一种敢于斗争的性格。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俗剽悍”。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也承认:“湖南之民族”,“富于敢死排外之性质”。^③湖南人这种比较特殊的剽悍性格在军事上容易发展为“尚武”,在政治上,当外侮日亟之时,就容易激发出一种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战国时期,屈原从事的抗秦斗争是典型代表。当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渐强大,为了争当统一中国的霸主,力图吞并其它六国,曾多次发动对楚国的兼并战争,严重威胁着楚国的安全与独立。满怀爱国热忱的屈原极力主张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坚决反对亲秦派对秦妥协媾和,并先后两次奉命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六国合纵,由怀王任纵长,联合攻秦,这次进攻不仅严重打击了秦国的侵略气焰,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楚国的地位。后来,由于楚怀王听信张仪答应秦国给予商于之地600里的谎言,中了秦国连横的奸计,中断了与齐国的联盟,结果丹阳一战,楚国为秦军所败,损失80多万人,失去汉中国土600多里。这时屈原早被流放到了江南很偏僻的地方,但他

念念不忘收复国土,在沅湘一带秘密开展抗秦救国的组织工作。公元前 278 年春天,秦军攻陷楚国的都城郢都,楚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正在流放途中的屈原悲痛欲绝,他不忍心看到祖国的灭亡,于是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奏出了湖湘大地古老而又悲壮的爱国主义乐章。这强烈的音符,从此便成了湖湘文化的主旋律。屈原死后,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光复楚国充满了信心。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陈胜、吴广建国号称作“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项梁起兵,亦拥立楚怀王的孙儿为义帝,以“从人民所望”。这些都说明楚国人民对自己生长栖息的国土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秦汉时期,中国的大统一已经实现,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复存在,但北方的强敌匈奴却屡侵边境,成为秦汉时期统一国家最大的外患。于是秦筑长城,企图阻止匈奴南下。汉初由于国力疲弱,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长期被贬谪在长沙的贾谊,对此十分不满,他反对汉朝皇帝对匈奴奴颜婢膝,输款纳贡,但也看到西汉政府还没有足够力量抗击匈奴入侵,于是他在上文帝的《治安策》中,提出了建“三表”、设“五饵”、“与单于争其民”的战略对策,主张多积蓄粮食,加强防御,以抗击匈奴的侵扰,并自告奋勇愿担此重任。为了引起当政者的警觉和重视,他“痛哭”、“流涕”、“长叹息”,甚至在忧虑中过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反抗侵略、制服匈奴的策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 年 4 月毛泽东在致田家英的信中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值得一看”。^④

2、反对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

对外反对外国侵略,对内反对分裂割据,是维护与巩固国家统一的两个重要方面。湖南各族人民一向注重团结御侮,仇视分裂背叛。从古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西汉初年,由于错误地总结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认为秦失败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因而使天子孤立无辅,于是汉初又大封同姓诸侯王,大多数郡县均划归诸侯王管辖,文帝即位时,全国的诸侯王有十多个,他们割地称雄,不断扩展

自己的势力,有的甚至骄恣叛乱,严重威胁着中央政府的安全,阻碍着全国的真正统一。贾谊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认为诸侯王势力的任意扩张,必然会导致“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的局面。为了巩固中央统一的国家政权,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即把一些大诸侯国分化成许多小诸侯国。这样,诸侯国的数目虽然增多了,但是却國小力弱,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也就小了。贾谊提出的这种主张,对于维护汉王朝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又如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益膨胀,各地节度使纷纷“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⑤他们在自己独霸一方的小王国内,任意增加租税,摊派劳役,为非作歹,使广大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为了扩大地盘,经常吞州并郡,互相火并,甚至互相串通,反叛中央,制造战乱。曾经长期生活在湖南的刘禹锡、柳宗元十分憎恨这种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积极支持的“永贞革新”运动中,即以宦官,藩镇为主要打击对象,实行了一系列坚决大胆的改革措施,如免掉藩镇李锜所兼的诸道转运盐铁使的要职,将财政大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等,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永贞革新”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反对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给湖湘人民以极良好的影响,成为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改革弊政,锐意创新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国家的统一,除了对外必须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对内必须反对分裂割据势力外,就是要重视修明政治,改革弊政,锐意创新,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一个政治黑暗腐败的国家,是无法担当实现国家统一和巩固国家统一任务的。战国时期,“七强”连年互相攻伐,争夺天下,按照当时各国的力量和政治形势,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的是秦国和楚国,合纵派策士苏秦就说过:“合纵则楚王,连横则秦帝”,这是对当时形势的正确概括。为了使楚国能够担当统一中国的重任,屈原在担任左徒期间,积极要求改

革内放,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发展经济,巩固国防。他痛斥那种“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腐败现象,因此却招来了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嫉恨,阴谋陷害屈原,楚王听信了靳尚的谗言,反而疏远了屈原。楚国的政治也因此变得更加黑暗腐败,国力日益衰退,最终不但没有成为统一中国的霸主,反而为秦所兼并。西汉初年,忠君爱国的贾谊与屈原几乎有相同的遭遇。贾谊在朝任太中大夫期间,才华出众,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政权,他向汉文帝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发展经济等一套革新建议。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使人民富裕起来与维护国家统一是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他说:“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⑥民富了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治理,才能依靠人民与分裂的诸侯王势力作斗争,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民的措施,包括奖励耕种,发展农业生产;提倡节俭,增加积蓄;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由国家统一制造货币,实行“法钱”,以稳定物价等等。这些措施,很多被汉文帝采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文帝正准备进一步提拔重用贾谊时,却遭到了一批贵族大官僚的坚决反对,对他进行种种污蔑诽谤,文帝只得将贾谊调出中央,放到偏远的长沙去作诸侯王的太傅,后又改作为梁怀王的太傅,使他满腹才华得不到发挥,一腔革新图强的抱负未能实现。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更是两位著名的革新家,为了改变当时唐王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政局,他们积极参与了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运动,史称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⑦刘、柳积极建言献策,为朝廷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进步的政策措施,如抑制藩镇割据势力,将方镇财权收归中央;罢宫市和五坊小儿,打击宦官势力;出宫女及女乐近千人;宣布蠲免百姓所欠一切租赋;禁绝各种杂税和例外进奉;明赏罚,任人唯贤等。“永贞革新”虽然在宦官、藩镇的阴谋破坏,联合进攻下失败了,王叔文被杀,刘、柳被贬为远州司马,可是他们坚信自己所进行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始终坚持改革,后来柳宗元在柳州、刘禹锡在苏州,利用他们掌握的刺史职

权,继续在地方推行局部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他们为改革献出了自己毕生精力,对巩固统一国家政权,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4、重视自然科学,振兴社会经济

无论是实现国家统一,还是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都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基础。战国时代,秦国之所以能最后统一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通过商鞅变法,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国力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统一六国雄厚的经济基础。汉唐之所以能巩固扩大全国统一政权,出现历史上有名汉唐盛世,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汉初通过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实行了一些发展生产和推动科学进步的措施,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很快;唐初实行“均田”、“薄赋”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湖南是道家思想的故乡,有着与其它地域不同的重视自然科学的优良传统。与儒家重视人际伦理关系的探讨不同,道家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自然事物歌颂备至。相传屈原在湖南流放期间作《天问》,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屈原在《天问》中所提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系统回答的是柳宗元的《天对》,而《天对》又恰恰是柳宗元放逐湖南永州期间写的。这除了柳宗元在政治上失意因而深切地同情屈原外,可能还与湖南之地继承了道家传统,重视探究天人关系分不开。柳宗元除了写作《天对》外,还写了著名的《天说》,而当时流放朗州(常德)、与柳志同道合的朋友刘禹锡认为柳氏还没有穷尽“天人之际”,乃作《天论》三篇。刘、柳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元气自动”,“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为发展社会经济、振兴湖南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湖南有着重视自然科学的传统,所以古代的科学技术也相当发达。战国时期,湖南的冶铸业有相当发展,在湖南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有戈、矛、槩、斧钺、剑、刀、匕首等,此外,楚式青铜镜也发现很多。据考古工作者统计,自1951年至1979年,我国共发现楚国铁器58批,168件。经金相检验,证实楚国在春

秋晚期不但有块炼铁(六合铁条)和白口生铁(六合铁丸),而且证实这时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渗碳钢水平,这些都说明当时冶铸业的进步。另外,湖南地区古代的手工艺也是相当发达的。例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衣服,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多,这些衣物全是家蚕丝织造,按织造方法不同,可以分为平纹的绢、纱、素色提花的绮和罗绮,以及彩色提花的锦,其中又以绒圈织锦最为珍贵,它们是汉初纺织生产所达到的最高工艺水平的代表作。古代湖南人在科技发明方面功绩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东汉时蔡伦造纸。蔡伦总结前人造纸经验,大大改进了造纸术,采用廉价的树皮、破布、旧鱼网作造纸原料,使造纸术得以全面推广,由中国到世界各地,为人类文明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汉代经济振兴创造了条件,强烈地表现出为促进祖国繁荣富强的爱国主义立场。

(宋玮明)

注: ①黄宗羲:《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②李棠:《益阳龙州书院志序》《湖南文征》卷28

③《宋教仁集》第10页

④《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5页

⑤《文献通考》卷26

⑥《贾谊集·大政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页

⑦《顺宗实录·五》